

CISHU YANJIU

1 9 8 3

1

辞书研究

- 积极开创辞书事业的新局面
辞书检索方法的统一及其途径
论汉字偏旁部首的规律

- 辞书编纂中国化问题讨论(三篇)
词典论
大型语文词典吸收古文字学成果问题

- 《汉语拼音词汇》的性质、作用和问题
词典中的“反词典”——《罗各特词典》
蔡元培的辞书学理论与实践

辞书研究

1983年 第一期

(总第十七期)

1	巢 峰	积极开创辞书事业的新局面
14	陈 原	性质、权威性、信念和方法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编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1	林丽楹	关于编纂台湾地名词典的几点意见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台湾分卷》编纂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 辞书检索法研究专辑 ·		
24	孙公望	辞书检索方法的统一及其途径
33	蔡勇飞	检字法与汉语词典的编纂
39	高世平	论汉字偏旁部首的规律
45	程养之	大型语文词典适用部首法排检
48	李鸿简	《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内容索引的特点
· 我和词典 ·		
61	严北溟	说到部首问题
63	苏渊雷	我和词典
65	张孟闻	从小学生时代说起
· 辞书编纂中国化问题讨论 ·		
68	王 涛	初论汉语词典的中国化
76	闵家骥	辞书中国化小议

82	林 峰	科技辞书中国化设想
85	黄建华	词典论
91	陈秉新	大型语文词典吸收古文字学成果问题
98	黄持刚	词典的编纂和语文研究的成果
103	许树声	方言中的古音古义和汉语词典编纂
107	任 远	论词典释义中的指代义
114	金文明	关于典故及其立目
121	周有光	《汉语拼音词汇》的性质、作用和问题
129	彭林宜	《汉日词典》原语释义讨论
133	梅家驹等	编纂汉语类义词典的尝试——《同义词词林》简介
139	何 勇	词典中的“反词典”——《罗各特词典》
142	汪耀楠	《词典学概论》读后
· 杂 谈 ·		
148	祝 耘	查不到及其他
150	朱若溪	一误三百年的一条书证
152	华 天	书例和释义
154	刘 金	“拗”字读音质疑
156	林 立	“笔画号码对照歌”
· 人 物 志 ·		
158	潘树广	蔡元培的辞书学理论与实践
166	张国朝	解缙和《永乐大典》

· 释义探讨 ·

172	张振书	也谈“主臣”的释义
175	王有布	“疾”与“疾病”
177	董乐生	“睡”字补义
178	王 畅	论“涿”

54	黄恩祝	中国古代索引略述
181	方厚枢	1981年我国出版辞书编目(续一)

辞书架 补白 读者·作者·编者

辞书研究 双月刊

第一期

1983年1月

编辑者: 辞书研究编辑部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印刷者: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

出版者: 上海辞书出版社

发行者: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市期刊登记证第29号

定价 0.50元

积极开创辞书事业的新局面

上海辞书出版社 巢 峰

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耀邦同志代表党中央再一次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在建设我国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否坚持这一社会主义战略方针，将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和成败。新中国的辞书事业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它既是文化建设的缩影，反映我国文化事业的发达程度，对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关系极大；又是思想建设的重要工具，有助于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理想教育、道德教育、纪律教育，提高我国人民的精神境界。这对物质文明建设显然有重要意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辞书事业的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两个文明的建设，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

形 势 和 任 务

我国是一个具有丰富文化遗产的古老国家，在周秦时期已有工具书的萌芽。最早的史表《史记·十表》，第一部词典《尔雅》、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在两汉时期就已产生。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明朝《永乐大典》，多达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规模之大，可以想见。近代以来，虽有《辞源》、《辞海》、《辞通》、《中国人名大辞

典》、《中国地名大辞典》等辞书问世，但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具书出版事业相比，已显得大大落后了。建国以后，出版事业虽有巨大发展，五十和六十年代初即已着手重编《辞海》、《辞源》和新编《现代汉语词典》等工作，但由于辞书内容浩瀚，编纂艰难，特别是在“左”倾路线影响下，编纂和出版辞书的道路越走越窄，出版发行者为数极少，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辞书事业日益得到重视和加强。专门从事辞书和其他工具书出版的专业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相继于上海、北京成立。综合性出版社和其他专业出版社，也纷纷在社内成立编辑室专门从事辞书编辑工作。辞书和其他各种工具书的出版事业出现了兴旺发达的景象。综合性词典就有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共收词目近十一万条、篇幅达一千三百四十万字的新《辞海》；语文词典就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新华词典》、《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和计划四卷已出三卷的新《辞源》，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语词增补本》等；双语词典就有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新英汉词典》、《法汉词典》，商务出版的《汉俄词典》、《汉英词典》、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汉日词典》等；百科全书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计划八十卷，已出天文和外国文学两卷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有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的计划九十卷已出五卷的《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等；专科辞典就有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法学词典》、《当代国际人物词典》、《世界地名词典》、《中国名胜词典》、《中国戏曲曲艺词典》、《测绘词典》、《宗教词典》、《简明社会科学词典》，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的《中药大辞典》，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计划八个分册已出三个分册的《中医大辞典》，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政治经济学辞典》，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会计词典》，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遗传学词典》等。与此同时，其他工具书如手册、

年表、年鉴、资料等出版物，也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在我国的辞书和其他工具书的园地中，寒冬已经过去，以《新华字典》作为我国辞书代表作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无论从品种、印数还是从规模来说，三中全会以后三年出版的辞书，并不亚于甚至超过解放后三十年出版的辞书。

虽然如此，辞书的落后局面，至今仍未根本改变过来。就语文词典说，《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均未出版。至于断代汉语词典、方言词典、引语词典、正音词典、专词（如同义词、反义词）词典、语法词典等各种门类的语文词典，或者绝无仅有，或者完全空白。语文词典中的双语词典，除世界上主要语种大多已有中型的以外，大量的小语种的双语词典为数寥寥。而主要语种的双语大词典，至今一本没有。国内少数民族语与汉语的双语词典，需要编纂出版的也很多。以百科全书来说，无论《中国大百科全书》，或是《中国医学大百科全书》等，编辑出版工作也还开始不太久。专科词典为数更少。哲学、经济、历史、文学、艺术、民族、教育、法学、社会学、心理学、地理等学科的词典，基本上还是零星现象或则处于完全空白的状态。科学技术方面的专科词典出版情况，虽较文、史、哲、经等社科词典为多，但也还远不能适应广大读者的需要。

辞书事业的落后状况，与我国国家地位和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历史任务极不相称，远远不能适应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需要。当务之急，就是要采取有力措施，进一步发展辞书事业的大好形势，从速改变它的落后状态，开创一个社会主义辞书事业的新局面。

辞书事业新局面的基本标志

辞书事业发展到何等程度，才算开创了新局面呢？我们认为以下各点是辞书事业新局面的基本标志。

第一，大型辞书初具规模

大型辞书包括大型百科全书、大型专科词典、大型语文词典、大型双语词典等,它们是知识的宝库,也是出版事业的骨干工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家的科学文化水平,对于教学和科研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文化积累上有特殊的价值。

作为国家重点科研出版项目,由汉语大词典编纂处编纂、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收词三十多万条、约有四千万字的《汉语大词典》;由汉语大字典编纂处编纂、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收单字六万个、约有一千万余字的《汉语大字典》;列入全国科研规划,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收词五万条、约有二千四百万字的《中国历史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篇幅将在一千万字以上的《经济大辞典》;由上海译文出版社编纂、收词十六万条的《新英汉大词典》、收词八万五千条的《德汉大词典》都将在八十年代出版。由中国地名委员会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具有三十个分册(分省)、几千万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和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科技大辞典》,都将在八十年代大部出版或全部完成。其他如《哲学大辞典》、《中国文学大辞典》以及农业、商品学等学科大词典已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和有关兄弟出版社开始规划,准备上马。预计在九十年代将有更多的大型辞书出版。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随着这些大型辞书的出版,该方面将有所突破,使我国辞书事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第二, 中型辞书形成体系

如前所说,目前无论语文词典或专科词典,缺门甚多,大片空白,亟待填补。如同没有实用的掘土工具就难于掘土一样,没有实用的工具书,对于学习、工作和科研的不便,是可想而知的。如果说大型辞书主要在于体现重点,那末,中型辞书则主要在于填补缺门。

学科门类是相对而言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学科分类也越来越细。就专科词典说,对一些基本学科和对于四个现代化建

设关系较大的学科，应尽快实现每一学科有一本实用的中型专科词典。以哲学而言，除《马克思主义哲学词典》外，还可以考虑分别出版中国哲学史、外国哲学史、逻辑学、美学、伦理学等方面的词典；以经济而言，除已经出版的《政治经济学词典》、《会计词典》外，还应有工业经济、农业经济、交通运输经济、商业经济、财政、金融、基本建设经济、世界经济、统计、中外经济史、中外经济思想史等词典。历史、文学、艺术、法学、教育、宗教、民族、心理、社会学、自然科学的各学科以及人名、地名等方面，都应视具体情况，或出综合性的专科词典，或出分类专科词典。总之，中型辞书应当配套成龙，形成一个出书体系。如果八十年代能有二百部至三百部质量较高的中型专科词典、若干部质量较高的中型语文（包括双语和少数民族语文）词典问世，辞书事业的局面就会有相当程度的改观。

第三，小型辞书遍地开花

小型词典简明实用，查阅方便，价格低廉，出书迅速，为一般读者所欢迎。小型辞书的选题，不必拘泥于学科系统性，一般以适应读者需要为原则，以初中或小学文化程度的读者为主要对象。商务出版的《新华字典》，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汉语小词典》、《简明同义词典》、《绘图儿童成语词典》和今年即将出版的《理论学习小词典》、《法律小词典》，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汉语成语词典》，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小词典》等都属于这一类。

在辞书园中，不仅要有参天大树和牡、芍、杜、菊等名花异木，也还要有各种小花和芳草。小型辞书在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和面向广大农村方面有特殊作用，是大中型辞书所无法代替的。而它编纂较易，需求甚多，理应比大中型辞书有更大的发展。遍地播种，遍地开花，力争小型辞书年年都有较大的丰收，是辞书事业新局面的标志之一。

第四，外国专科辞书中译本日益增多

从本世纪四十年代开始，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技术革命的新

时代,知识更新的速度大大加快。这一客观形势,对辞书提出了新的要求。除了我国编纂的辞书,需要不断吸收新知识外,必须不断翻译外国新出的辞书,特别是其中的专科辞书。因为,这对于引进新的知识,掌握新的信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科学出版社翻译美国的《科学技术百科全书》,就是从此点着眼的。毫无疑义,一部有三十卷的《科学技术百科全书》,一定会给我们送来许多新的信息。

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也如此。以社会学来说,解放以来,由于“左”的错误的影响,几乎无人问津,不敢触动。结果,在一部收词近十一万条的《辞海》(1979年版)中,社会学方面只收了二十余条,真可谓“大海捞针”。而西德一部《社会学词典》,即有七千五百个条目,两相对照,可见三年前我国社会学研究的落后情况。虽然西方出版的辞书,大多不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但没有比较也就没有鉴别,没有借鉴也就没有发展。这样,就难于建立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体系,难于编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词典。

即使是哲学、经济学、文学等基本学科,同样日新月异,不断出现新的研究成果。如果我们对各国的各该学科的辞书不断进行整理,选译一些参考价值较大的词目,分辑出版《哲学名词选译》、《经济学名词选译》以及其他各学科的名词选译,对于扩大我们的视野,推动我国的科学研究,都将大有裨益。

当前,外国专科辞书中译本出版极少,与我国对外开放政策和“四化”建设很不相称。这方面值得一提的除科学出版社的翻译项目和上海辞书出版社翻译出版的《语言和语言学词典》、知识出版社翻译出版的《简明美学辞典》外,还有六十年代即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开始翻译、目前正由上海译文出版社继续进行的苏联《简明哲学百科全书》,以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正在进行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简编》和新版苏联《百科辞典》的翻译工作。加强这方面辞书的翻译和出版,使它繁荣昌盛起来,也是辞书出版战线的一项重

要任务。

第五，具有中国特色的辞书有较多的出版

中国有数千年的文化历史，有五十多个民族，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出版具有中国特色的词典，是我们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任务。打开这几年的出书目录，要花好大力气，才能找到反映我国特色的辞书。例如《中药大辞典》、《中医大辞典》、《中国戏曲曲艺词典》、《中国名胜词典》、《中国古代青铜器小辞典》等。有鉴于此，上海辞书出版社将从明年起陆续出版或计划出版《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国哲学史词典》、中国文学艺术方面的《唐诗鉴赏词典》、《中国珍贵文物词典》、《中国剧种词典》、《陶瓷词典》、《中国园林词典》、《中国地名语源词典》、《中国神话传说词典》、《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词典》、《中国少数民族艺术词典》、《中国风俗词典》以及《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手册》等等，我们殷切希望同兄弟出版社一起，共同努力制订这方面的长远规划，为发掘我国的文化遗产，整理、继承、积累和传播我国的灿烂文化，作出贡献。

凡具有中国民族特色、文化特色和地理特色的辞书，无论是语文词典或专科词典，必将引起海外读者的注目。如《中国名胜词典》在香港畅销，就是一例。它们是传播中华民族文化的良好形式。

八十年代的辞书事业，着重于雪中送炭，主要解决从无到有的问题；但在可能条件下，也不排斥锦上添花，搞一些好上加好的东西。譬如，出一部具有高度艺术水平的图文并茂的《中国珍贵文物词典》，当然会受到国内外广大读者的欢迎。

与此同时，手册、年表、年鉴、年谱、索引、引得、汇释、资料等其他工具书编纂和古代近代类书、辞书的整理重印，定有更大的发展。它们将与现代辞书一起，组成一个工具书的海洋。

此外，在保证内容质量的同时，在装帧设计、版面插图、纸张印刷等形式方面，也要力争有所突破。词典是“典”，人们称之为“标准

书”，“引经据典”，以此为凭。而高质量的辞书，往往父传子，子传孙，使用寿命很长。因此，无论内容和形式，都应有更高的质量要求。这几年辞书出版事业的基本情况良好，但东抄西摘、粗制滥造，甚至以摇钱树为辞书出版目的者，也不是绝无仅有的。这种现象必须引起注意并应坚决加以克服。辞书的质量除内容好外，并形成我国特有的风格。力争图文并茂，在装帧设计、版面插图、纸张印刷等形式上，必须摆脱落后、陈旧、呆板的状态，至迟在九十年代前期，要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图书博览会上。

开创辞书事业新局面的基本措施

以上所说，有如一张建设大厦的蓝图，只有采取有力措施，积极创造条件，才能真正实现。那末，应当采取哪些主要措施呢？

一、制订和落实辞书出版规划

各类大中型辞书，一个人或几个人能成书者为数极少，一般少则十几人、几十人，多则成百上千人，通力合作，才能编纂成书。这些具有相当规模的著作，如果不作规划，就会盲目发展，失去方向。那些“票房价值”较高的选题，竞相出版，而那些发行量虽然不大，但在填补学科空白上有较大作用的辞书却会无人过问。据不完全统计，成语方面的词典，因“票房价值”较高，几年以后，将有十余种之多；而断代语和方言辞书却因读者面较窄而将长期难以见书。再如，文学家、艺术家、历代作家或著名作家的人名词典，也因发行量较大，这两年来就出了好几个版本，其中史实错误和评价不当者不乏其例。这类书估计今后几年还会增加，颇有泛滥趋势。这是一种不正常的一窝蜂现象。另一方面，一些有志于辞书事业的出版社，组织编写了一些颇有价值的辞书，但因不了解全局情况，常常相互“撞车”。同一学科并不是不可以有两本以上的辞书，但在较长时间内，填补学科空白，做到从无到有，仍是辞书出版事业的第一位任务。相互重复，分散力量，是人力物力的浪费。即使在若干年后，同

样学科、同样性质、同样规模的词典,也没有必要重复过多。从长远来说,更应该考虑我们究竟要编纂哪些大中型专科辞书,要翻译哪些外国辞书,要出版哪些有中国特色的辞书,对此应当有一个共同明确并为之奋斗的目标。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在辞书出版事业中同样可以适用。建议文化部出版局主持其事,从速制订全国辞书编纂出版计划。

为了保证计划实施,必须按照选题,明确分工,落实任务。特别对大型辞书应当逐项研究,在人力、财力、物力上提供相应的保证。此后,计划内的选题(大中型)不准重复,计划外的选题必须报请文化部出版局核批。至于小型辞书,可以灵活安排。用经济术语来表达,大中型辞书必须采取指令性计划,而小型辞书则可采用指导性计划。国家出版机关,可以运用适当方式,通报选题,指出方向,引导辞书出版事业健康发展。

二、建立和扩大辞书作者队伍

辞书的作者队伍可分为专业与业余两种。前者如《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编纂处的成员,他们是专业辞书编纂者,终年为辞书出版事业奋斗;后者则是不同学科的科研、教学 and 实际部门的有关人员,他们在从事本职工作的同时,承担一定的辞书编纂任务。任何生产,劳动者都是主要条件之一。辞书当然也不例外,离开从事辞书编纂的作者,必然一事无成。不断扩大和巩固辞书作者队伍,是发展辞书事业的关键所在。

编纂辞书,是严肃的科学研究。一条有质量的条目,远胜于一篇平庸的论文。那些数年如一日,为填补学科空白而编纂出各学科第一本词典的人们是名副其实的拓荒者、开路人。那些为拿下重点项目,为各种大型辞书而奋斗的编纂人员,更是攀登喜马拉雅山的登山运动员。即使是编写各种小型词典的同志,也在撒播科学文化的种籽。他们都应当受到人们的尊重。那种把编写辞书看成雕虫小技的观点,是十分错误的。建议在评定职称、考核干部的时

候,把编写辞书作为科研的一个方面,这对于辞书事业的兴旺发达是有重大意义的。

辞书作者队伍的建设,除了发展数量以外,还有一个提高素质的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后者较前者更为重要。如前所说,辞书事业关系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关系到后代子孙德育、智育的发展,没有对人民负责、对事业负责的精神,没有严谨的治学态度,都难以胜任辞书的编纂工作。辞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它要求全体作者识大体,顾大局,服从统一计划,统一体例,相互协作,善于求同。辞书往往费时较多,反复较大,克服急于求成,急功近利情绪,培养不怕挫折的韧性精神,是辞书编纂人员应当具备的修养。辞书有特殊的文体和编写要求,任何没有编过辞书的专家,都要善于学习并逐步掌握它的规律,从而使自己既是某个学科的专门家,又是辞书编纂的专门家。

三、加强编辑队伍的培养和建设

建设一支有相当数量的又红又专的辞书编辑队伍,是发展辞书出版事业的另一个关键。如果把辞书作者比成玉石矿藏的开拓者,那末,辞书编辑也可称为玉石的雕塑者。玉不琢,不成器。只有经过编辑精心加工,才能使辞书最后定稿成书。

辞书编辑是精神文明的建设者,只有甘心于为别人作嫁衣的人,才能安心并做好这项工作。因此,一不为名,二不为利,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是辞书编辑队伍建设的基础。辞书编辑应当具有强烈的职业责任、高尚的职业道德和严明的职业纪律。德才兼备,又红又专,是培养辞书编辑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

辞书的组织工作总是先于编辑加工。因此,辞书编辑首先是辞书的组织者,既要运筹在前,提出选题,拟订计划,又要安排于后,根据计划,组织作者,协同作战。善于计划,善于安排,善于组织,是辞书编辑的基本功。辞书编辑既是辞书编纂业务的专门家,又能掌握一、二门专科知识,并旁及其他领域的知识。他们应当有

一种职业的敏感(政治的、专业的、辞书业务的)和加工的能力,从而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稿件中的问题。他们应当有与众不同的严谨的编辑作风,即使一个标点也不能苟且过去。精美的玉雕属于一丝不苟的雕塑者,而决不属于粗制滥造的庸匠。那种打着“文责自负”的招牌,不审稿、不加工的做法,以及虽然审稿但又草率了事、马马虎虎的作风,是编辑队伍建设的大敌,必须坚决克服。

怎样保证扩大辞书编辑队伍并使之后继有人呢?大学中文系设辞书专业固然是个办法,但现代辞书涉及一切学科领域,不只是语文词典,中文系培养辞书编辑有一定局限性。而各科大学毕业生虽然具有一定的专业基础,但对辞书业务却一无所知,走上工作岗位后,往往需费较长时间的摸索,甚至七八年、十余年才能成为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称职的编辑。何况分配大学生常有这种情况:单位需要的没有,不需要的却分配进来,造成又缺又多,畸轻畸重。怎样才能使人才对路并多快好省地培养出辞书编辑,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有同志建议在出版系统(或与大学、社科院联合)筹建辞书研究所,除深入开展辞书理论研究外,可根据辞书编辑的实际需要,直接招收辞书专业研究生;研究所应与辞书专业出版社挂钩,使理论与编纂辞书的业务实践密切结合,造就专业人才,使之成为辞书编辑队伍来源的一个重要渠道。这个建议值得重视和研究。

四、加强辞书理论研究

随着辞书实践的发展,我国辞书理论研究也有了相应发展。除一些大学中文系设辞书专业外,全国唯一的专业刊物《辞书研究》于1979年创刊。这个刊物,几年来刊登了不少关于辞书理论的文章,深受国内外读者的欢迎。专门从事组织和推动辞书理论研究的学术团体——上海市辞书学会也于1982年7月成立。这些都说明了辞书理论研究已日益为人们重视。

但是,必须看到,至今我国还没有专门从事辞书理论研究的单

位,也没有形成一支专业理论队伍。整个辞书理论研究工作,没有一个中心,也缺少规划,不成体系。改变辞书理论研究的分散落后状况,积极筹备辞书研究所,应当放到发展辞书事业的主要议事日程上来了。

在我国,一些从事辞书理论研究的同志(多是兼搞),往往没有或缺少辞书编纂的实际经验;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则大多没有接触过辞书理论或者对辞书理论一知半解。这一状况,很难使辞书的实践上升为理论,也很难用这种理论来指导实践。这对于辞书事业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搞辞书理论的同志应当亲自参加一些辞书编纂工作;而编纂辞书的实际工作者,则应重视辞书学的学习和研究,人人都应成为业余辞书理论工作者。从而,把辞书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起来。专业与业余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辞书理论研究应当倡导的治学方法,也是辞书事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我们固然要借鉴外国的东西,但一定要走自己的道路。要从总结辞书编纂出版(包括分类、选题、规划、组织、收词、释义、定稿、检索、资料、装帧、印刷等等)的实际经验入手,逐步整理提高,找出辞书编纂出版规律性的东西,形成中国独特的辞书学。唯有如此,才能指导辞书事业不断革新,不断前进!

五、大力提高印刷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

我国印刷生产的现状,无论从数量或质量来说,都不能适应辞书事业发展的要求。排字、印刷、装订的生产能力不足,常常影响辞书及时出版。由于封面材料单调,版面设计呆板,胶印印书能力特别薄弱,辞书形式至今仍不能摆脱陈旧落后的状况。在印刷生产力全面紧张的情况下,出版社有求于印刷厂,能够出书已属万幸,难以要求提高印刷质量。这种情况,如果长此以往,必将成为辞书出版事业发展道路上的桎梏,无论从工业建设或文化建设来说,都有必要来一个迅速革新。从辞书事业发展趋势来说,必须从速完

成从以铅印为主到以胶印为主的技术转移。唯有如此，才能推动辞书的纸张、材料、装帧、设计等有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才谈得上图文并茂，从而使辞书的形式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六、加强资料建设

编纂辞书，必须掌握第一手资料。那种仅仅从其他辞书中抄抄摘摘的方法，是最没出息的编纂法。这样做，人家错了自己也跟着错了，人家已经改正了，而自己还不知道错在何处；由此可见，没有第一手资料，真正的辞书编纂工作是寸步难行的。

根据辞书的特点，资料工作的重点应当放在词目和释文内容的积累、资料的整理和运用上面。如何持之以恒，编制资料卡，把死资料变为活资料，一般资料变为辞书资料，为辞书编纂源源不断地输送更多更新的原料，是辞书资料工作的重大课题。如何把手工业整理资料的方式改造为现代化的处理方式，也应当提到开创辞书出版事业新局面的议事日程上来了。顺便说一说，象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是辞书编纂和出版的中心，如能建立辞书或出版资料中心，将是辞书或出版事业的一项重大基本建设工程。其意义是自不待言的。只有切实做好资料工作，才能为辞书编纂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

积极开创辞书事业的新局面，是今后二十年内摆在全国辞书编纂出版工作者面前的义不容辞的历史任务。为了完成这一历史任务，从现在起，从领导部门到每一个工作人员，都要在十二大精神的鼓舞和指引下，从开创辞书事业新局面的高度出发，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努力走出一条重效率、讲实效的新路子。倘能如此，这一历史任务一定会大大提前实现。